

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论文集系列

总主编 束定芳

认知语用学研究

吴炳章 徐盛桓 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论文集系列

总主编 束定芳

认知语用学研究

吴炳章 徐盛桓 主编

中国认知语言学 20 年(代序)

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继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只重抽象语言系统研究的语境消解(Decontextualization)潮流之后,在世界语言学发展出现语境重置(Recontextualization)趋势的过程中,与将意义融入语法研究的系统功能语法(Halliday, 1994)和将词汇融入语法研究的词项语法理论(Word Grammar Theory)(Hudson, 1984, 1990 等)等一起出现的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过去的 20 年里,从最初的引进、介绍到迅速发展、多方位应用,及至近几年语言学界开始的理论反思,中国认知语言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内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在回顾中国认知语言学过去 20 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取得的成绩、主要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等进行简要分析和勾勒,旨在对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进行反思,并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中国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如果把 James H. Y. Tai(戴浩一)1988 年由黄河翻译并发表于《国外语言学》上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①一文作为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开端的话,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已经历了整整 20 个年头。为呈现这期间的总体发展轮廓和趋势,我们对 1988 年至 2008 年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语言类刊物上发表的认知语言学方向的论文和引进、

① 该文章的英文原文“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于 1985 年载于 Haiman 主编的 *Iconicity in Syntax*, 由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出版。

出版的主要著作做了统计(见图 1 和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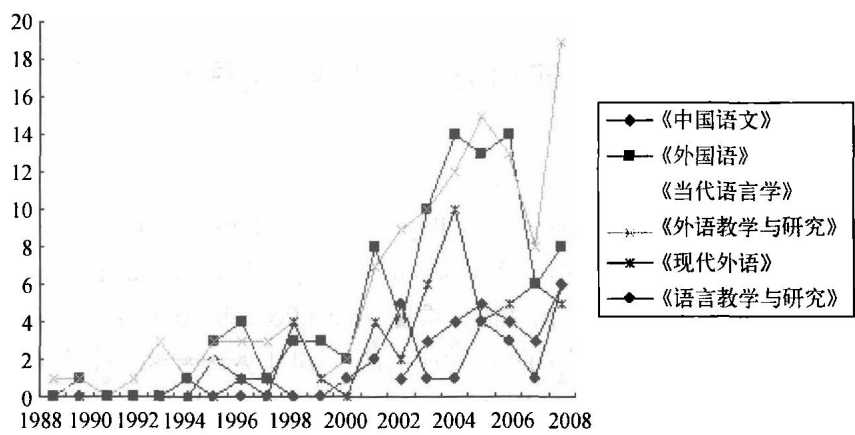


图 1 六种主要语言学刊物认知语言学相关论文的发表情况统计(1988—2008)

表 1 国内认知语言学专著出版、引进情况(1988—2008)

	时 间	1988—1998	1999—2003	2004—2008
国内专著	总 量	2	16	108
	认知语法	0	7	13
	概 述	0	2	32
	认知语用	0	1	12
	认知语义	0	1	38
	应 用	2(1998 年)	3	13
引进著作	总 量	0	9	6
	认知语法	0	3	2
	概 述	0	1	2
	认知语用	0	0	0
	隐 喻	0	2	1
	认知语义	0	1	1
	类 型 学	0	1	0
	应 用	0	1	1

其中论文来源于六种语言学类主要期刊:《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和《当代语言学》。前五种是我国汉语和外语界引用、转载率较高的刊物,《当代语言学》则是侧重国外语言学成果引进以及与汉语研究结合的代表。

从图1可以看出,20年来我国认知语言学研究论文的数量、范围、水平都在大幅提高,其主要发展趋势在各刊物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即最初约10年的稳步增长和21世纪以来的全方位迅速发展。

对认知语言学相关著作的检索主要通过北京图书馆馆藏书目中含“认知”或“语言”的书目查找,人工缩小范围后,再利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社网站进行搜索和补充,统计结果见表1。

依据这20年间的论文、专著的数量及其涉及的主题范围和研究方法,我们将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粗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初步引进与应用阶段(1988—1998),(2)多方位介绍与发展阶段(1999—2003),(3)发展、反思与国际化阶段(2004—2008)。需要说明的是,这几个阶段并非界限分明、相互独立,而是一个彼此交错、渗透的过程。

1.1 初步引进与应用阶段

国外认知语言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1975年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举办的语言学暑期班上宣读的四篇论文,分别是Paul Kay有关颜色词的研究,Eleanor Rosch对基本层次范畴的研究,Leonard Talmy对多种语言中空间关系表达方式的讨论和Charles Fillmore关于“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的论述。

我国语言学界从认知视角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进行尝试的是旅美台湾学者James H. Y. Tai(戴浩一)(陆俭明、郭锐,1998)。他的《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1990,1991)一文,从非客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语法结构始于对现实的符号化,力图建立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系统,从而揭示中文独有的潜在概念原则,如时间顺序原则、整体部分关系原则、凸显原则以及信息中心原则等。文章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蜚声译介到国内。叶蜚声曾向国内学界译介了很多卓有影响的国外语言学家及其理论,如索绪尔、雷柯

夫、菲尔墨、韩礼德等。翻译介绍戴浩一的文章,是他连续两期发表在《国外语言学》上的访谈文章《雷柯夫、菲尔摩教授谈美国语言学问题》(1982)介绍国外最新语言学动态的延续,是他对国际语言学发展动向的敏锐观察和把握,也是他试图通过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为国内语言学研究学者解决汉语言研究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的一个尝试。

戴浩一以汉语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完全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角度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这一新动向引起了国内语言学界的极大兴趣,也对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外语言学》发表的三篇译介戴浩一研究成果的文章(1988,1990,1991)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理论在中国的正式传播。自此,国内语言学界开始了对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持续关注,早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国外认知语言学奠基之作的评介和相关理论综述。对重要著作和文章的评介是研究成果和理论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期刊论文中,这类文章占了相当的比重,也为我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见表2)。

表2 早期评介的主要认知语言学著作

年 份	著作、作者及译/评介者	发表刊物
1994(1)	<i>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i> (Langacker, 1987), (沈家煊评介)	《国外语言学》
1995(2)	<i>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i> (Lakoff, 1987), (石毓智评介)	《国外语言学》
1995(3)	<i>Metaphor and Iconicity</i> (Hirag & Radwanska-Willims, 1992), (林书武评介)	《国外语言学》
1996(1)	<i>The Metaphorical Basis of Language — 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s or the Left Handed Hummingbird</i> (Kelley, 1992), (王勤学评介)	《国外语言学》

②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索引统计,关于《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的论文自1998年以来引用率达68次。

(续表)

年 份	著作、作者及译/评介者	发表刊物
1996(2)	<i>Patterns in the Mind: language and Human Nature</i> (Jakendoff, 1993), (程琪龙评介)	《国外语言学》
1997(3)	<i>Languages of the Mind</i> (Jakendoff, 1995), (董燕萍评介)	《国外语言学》

除了书评,综述类文章也为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铺垫和导航作用,如《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束定芳,1996)、《国外隐喻研究综述》(林书武,1997)、《国外认知语言学综观》(文旭,1999)、《“认知语法”的概括性》(沈家煊,2000a)、《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及形成过程》(赵艳芳,2000)等。

由此可见,《国外语言学》、《外国语》及《外语教学与研究》等语言学刊物为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起步提供了一个平台。沈家煊、石毓智等一批学者自20年前就开始关注认知语言学,为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汉语语法研究中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直接应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汉语的语序、词类等问题的研究都有所启发,能解释一些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不好解释或不能解释的问题。陆俭明(1988)针对类似“‘盛碗里两条鱼’成立,‘*盛碗里鱼’不成立”的语言现象,指出“一定的语法范畴(数量范畴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一定的句法结构都会起一定的制约作用”。沈家煊(1995)则用“有界”和“无界”的概念解释了数量范畴为什么会对此类双宾结构起制约作用,并引入“有界”和“无界”的概念来划分词类,对名词分为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动词分为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这三者加以概括,说明词类划分背后的认知理据。另外,刘宁生(1994)对汉语空间关系表达的研究,袁毓林(1994)对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等都是直接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试图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这期间的专著——《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张敏,1998)和《语言的认知研究与计算分析》(袁毓林,1998)也主要是引介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并用以解释一些具体的汉语语法现象。

(3) 隐喻、原型理论的介绍与应用。原型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颠覆

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观和隐喻观,对于认知语言学核心主张的确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在我国认知语言学发展初期隐喻和范畴观相关研究也占了相对较大的比例,如袁毓林(1995)应用“家族相似性”概念对汉语词类的划分,束定芳(1996,1998)对隐喻的本质、工作机制的探讨等。

另外,对语言、认知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探讨也是当时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桂诗春(1991)对“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的探讨,熊学亮(1993)对“认知科学和语言学”关系的讨论等。

1.2 多方位介绍与发展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约 1999 年—2003 年),随着研究成果数量和涉及的主题范围的大幅增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进入了多方位介绍与发展阶段。论文、专著的数量大幅增长,涉及的主题范围迅速扩大,各类学术会议相继召开。

(1) 论文专著数量大幅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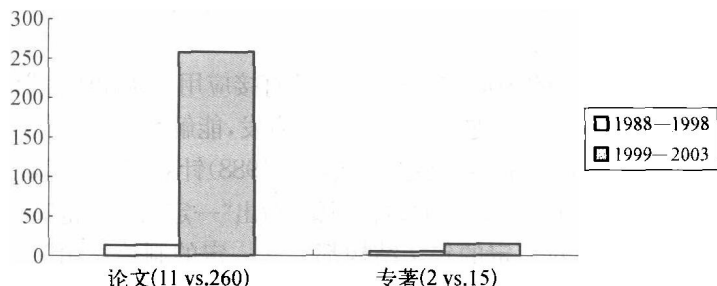


图2 第二阶段(1999—2003)与第一阶段
论文、专著数量(1988—1998)对比

从图2看出,在第二阶段短短五年时间里,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论文260,专著15)远远超过了第一阶段11年(1988—1998)的总数(论文11,专著2)。

正是在这期间,沈家煊(1999a)、石毓智(2000,2001)、束定芳(2000)、熊学亮(1999)、张辉(2003)等相继出版了十几本专著,极大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及应用的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也通过引进版权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认知语言学原著,如 Langacker(1987)的

《认知语法基础》(*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Ungerer 和 Schmid 合著的《认知语言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等,为中国研究者和学习者直接研读原著提供了极大方便。

(2) 主题范围迅速扩大。相比第一阶段主题集中于隐喻、原型理论及对认知与语言关系的探讨,第二阶段涉及主题的数量大幅增长(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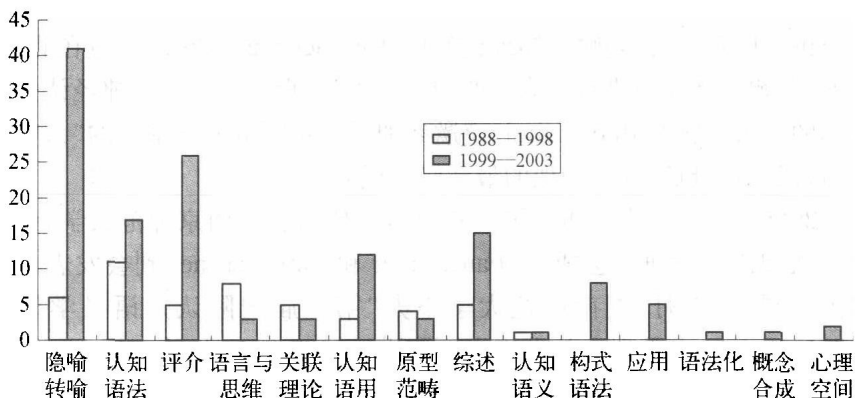


图 3 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主题统计对比

从图 3 看出,国内认知语言学研究第一阶段的主题较为集中,主要探究了汉语语法认知、语言与认知的关系、隐喻和转喻等方面。相比之下,在第二阶段,一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有关隐喻和转喻的探讨激增,评介类文章、认知语用、认知语义方面的研究也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语法化、概念合成、心理空间、认知语言学在翻译、文学、教学、词典学等领域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大幅增加。

(3) 各类学术会议与学术讲座相继举行

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也体现在各类全国性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的召开。认知语言学研讨会自 2001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迄今为止已达五届。

2001 年,首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与会代表 70 余人。2003 年,第二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与会代表 100 余人,心理空间理论创始人 Fauconnier 应邀到会发表主题演讲。

1.3 发展、反思与国际化阶段

2004年以后,一方面,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论文、专著的数量稳步上升,涉及范围日益扩展,同时各类研讨会和主题学术会议也频繁召开。2004年,第三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代表200余人,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认知语法基础》作者Langacker和构式语法代表人物Goldberg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同年4月,隐喻认知理论的奠基者George Lakoff应邀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高校进行了为期两周左右的巡回演讲。5月,神经认知语言学的代表人物Sydney Lamb应邀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认知功能语言学讲习班”,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6年5月,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学会成立,Fauconnier和Mark Turner到会发表主题演讲。同年11月,湖南师范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认知语义学研讨会”,L. Talmy应邀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2007年5月,第五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召开,Langacker、Geeraerts、Tsur、Panther等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7月,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被正式接纳为国际认知语言学的成员。2008年7月,首届中德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德国召开。

另一方面,在对国外理论介绍应用的同时,国内一部分学者也对相关问题的问题和缺陷进行了反思(如刘正光,2001)。2004年以后,中国学界客观思考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及对汉语研究适用性的研究明显增长。如石毓智(2004a,2008)、邓云华,石毓智(2007)等指出了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以及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还对语言规律的多样性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陆俭明(2004)提出“词语句法、语义的多功能性”来解释构式语法尚未解释清楚的问题:“为什么相同的词类序列、相同的词语、相同的构造层次,而且相同的内部语法结构关系,甚至用传统的眼光来看还是相同的语义结构关系却会造成不同的句式,表示不同的句式意义”。沈家煊(2008)也指出语言学家的任务不是研究语言学理论而是语言,强调基于语言事实而非基于语言流派的研究。

二、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2.1 研究涉及的范围广,参与的人数众多

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范围广,参与人数众多。这在专著、期刊论文数量、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都有体现(见表3)。

表3 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分布及主题(1988—2008)

研 究 主 题	期 刊 论 文	博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认知语法	49	48	560
认知语义	30	50	14
隐喻、转喻	79	20	1 615
认知语用	34	10	153
概 述	38	3	0
构式语法	23	6	28
语 法 化	5	4	20
心理空间、概念合成	7	0	183
对比研究	16	14	174
语言类型学	5	2	15
书 评	53	0	0
应 用	14	14	1 000
总 计	331	157	1 892

注:以上期刊论文统计来源于前文提到的六种语言类核心期刊,专著统计中“对比研究”与其他主题的数量重叠,论文集都并入“概述”,这里的硕上、博士论文是以中国期刊网为基础的不完全统计。

从表3看出,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几乎涉及认知语言学所有相关领域,参与人数众多并逐年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中国从事语言学研究的高校教师、博士、硕士研究生总人数大幅增长。以

博士论文为例,2004年至2008年收录于中国期刊网“中国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相应也带来了认知语言学相关论文的增长(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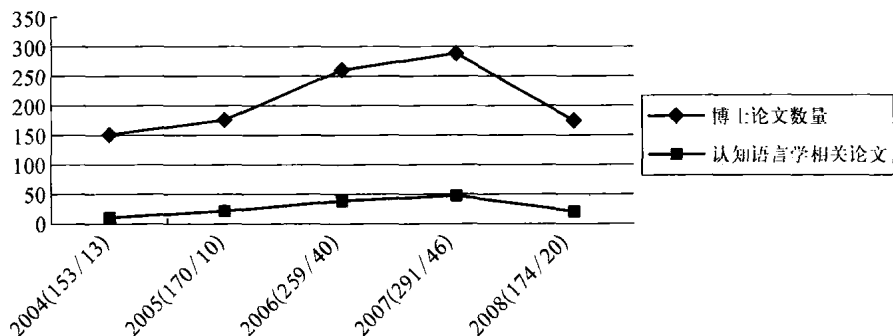


图4 语言文字方向博士论文及认知语言学相关
博士论文数量与趋势(2002—2008)

其次,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也与汉语界和外语界学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语言学研究可粗略分为外语界的研究和汉语界的研究,语言学在学科分类中被分为“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前者关注语言的普遍理论,特别关心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能够迅速将国外新成果介绍到国内,并力图应用到具体语言材料的分析以及外语教学过程中去。后者主要关注汉语语言事实的描写和解释,更关注如何发掘和解释汉语现象,服务于汉语教学和其他信息时代的其他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语言学家关注国外语言学新理论,并应用于汉语语法研究,以解决具体的汉语语法问题。总之,前者侧重理论的介绍,关注理论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后者更关注的是理论的实用性。这两种背景的语言学家所从事的语言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也导致了我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出现研究范围广、人数众多的特点。

此外,我国学者对隐喻和转喻的特殊兴趣也对国内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没有隐喻研究,很难想象当今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没有对隐喻的探索,这个语言学分支的发展历程也许要缓慢很多。”(Hamilton,2004: 104)这一点在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同

样的体现。两个发展阶段的主题统计结果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即关于隐喻、转喻的研究数量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其比例远远超出其他主题,达总数的 20%。隐喻、转喻不仅成为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也一度成为中国认知语言学的驱动力。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2000)是最早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系统、全面地介绍隐喻研究的著作,在对西方隐喻理论进行吸收和整理的基础上,对隐喻的产生原因、工作机制和本质特征以及隐喻的功能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和分析。该著作对国内认知语言学研究,特别是隐喻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认知角度出发对汉语中比喻的研究,也为我们对概念化的文化特异性以及普遍性结构的认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Schmidt, 2008)相关研究涉及其运作机制、分类、区分等理论层面,也涉及在翻译、语篇分析、外语习得等方面的应用等。例如,沈家煊(1999b)提出了转喻/转指的认知模型,结合“认知框架”和“显著度”两个重要概念,论证汉语“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语法转喻”,比以往的论述具有更强的概括力和解释力。陈家旭(2000)指出隐喻转喻是主要的造词方式。刘正光(2000)揭示了名词动用过程中的隐喻思维等等。

最后不能不提的一点是认知语言学理论本身所特有的吸引力。与形式语言学相比,认知语言学关注的语言现象丰富多彩,使语言研究变得饶有趣味;同时认知语言学关注不同语言之间,以及同一语言中相似形式之间的差异,其解释性对于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沈家煊, 2008)。

2.2 针对汉语研究问题的借鉴与应用而非对乔姆斯基理论的反动

Sampson(1980: 130)曾经指出:“任何语言学家都要通过与乔姆斯基理论的联系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也正是在对乔姆斯基理论的直接批判和反动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假设——语言能力不是自主的认知能力、语法就是概念化形成过程、语言源于语言使用(Croft & Cruse, 2004: 1),本身都代表了认知语言学开拓者们对当时主流语言学方法——生成语法和真值条件语义学的反动。正因为认知语言学关注的知识类型与生成语法的不同,更因为其经验主义的本质,人们常把它称为“第二次认知革命”,而把生成语法称作

“第一次认知革命”。(Geeraerts & Cuyckens, 2007: 7)

中国认知语言学发展完全出自不同的背景和传统。尽管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早在 1979 年就被译介到中国,但生成语法理论并未被广大的汉语研究者所接受,没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系统应用,也并未如在美国那样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实际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最初的引进与借用是部分语言学家为了走出汉语语法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困境的一种尝试,有着中国的汉语语法研究特有的学术背景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马氏文通》(1898)问世到 20 世纪初,我国汉语语法主要是参照印欧语系建立。40 年代出现了 20 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鼎盛时期,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老一辈语言学家以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挖掘汉语语法特点为宗旨,发现并解释了不少汉语语法的自身规律。新中国成立后,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大大普及了语法知识,也促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随着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和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译)等的翻译出版,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开始影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尤其是在 80 年代,受结构主义和描写主义语言学影响的学者成为中国语法研究的中坚力量,使汉语语法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和突破。一方面,层次分析已成为共识,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格”语法分析、配价分析等也被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学者们具备了立体研究观念,确立了“三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的研究思路(见陆俭明、沈阳,2003)。其中“语用”平面的引入反映出汉语界试图从形式之外来寻求观察和解释语言现象的方法。

受结构主义理论影响,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描写为目标。80 年代后期陈平(1987)《描写与解释》一文发表后,对现代汉语语法现象、语法规则的解释开始引起汉语语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学者们陆续发表论著,力图寻求观察、描写和解释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沈家煊(2000b: 19)指出语法研究所追求的目标,高一点的是要对哪些合乎语法、哪些不合语法作出预测(predication),低一点的是要对合乎和不合法的现象作出解释(explanation)。陆俭明、郭锐(1998)对于汉语界进行认知研究的目的和作用进行了解释。他们指出,汉语语法认知研究的目

的是试图从人的认知角度对种种语法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要求自己所作的解释在语法形式上能找到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证据。如从“临摹性”、“典型范畴”、“常规关系”、“隐喻”等角度,对汉语的词序、词的重叠、词类的本质特点、肯定与否定既对称又不对称的特点等现象与问题所作的解释。同时,认知语法学还能挖掘出一些用以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所不易发现的语法现象,比如张敏(1998)从认知角度解释偏正结构中“的”字隐现问题时挖掘出来的关于“我儿子”、“我的儿子”等结构的区别与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理论,较强的解释力是它在国内语言学界迅速传播和应用的重要原因。在从认知角度对于汉语语法现象进行解释方面,沈家煊所作的工作引人注目。他的研究以解释和预测为目的,将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汉语语言事实结合,从认知视角很好地解决了汉语语法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利用转喻认知模型对“的”字结构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的”字结构是汉语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朱德熙(1983)指出,“的”字结构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的”字结构为什么转指时意义范围广泛;二是“的”字结构转指时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对此沈家煊(1999)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框架”和“显著度”两个重要概念,解释了“NP的”、“VP的”、“AP的”这类结构转指的条件和限制原则,认为“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是语法转喻作用的结果,转喻是人们基于日常体验建立的同一个认知框架中要素之间参照和激活的结果。沈家煊通过对转指的转喻阐释,不仅解释了语言表达合乎语法和不合乎语法的认知理据,还对语法现象作部分的预测,说明它们是受倾向性原则支配的。

2.3 外语学者和汉语学者的互动与互补

科学研究不光涉及概念、模型、方法,同时也涉及到人物、活动及其交流方式(Geeraerts & Cuyckens, 2007)。在中国,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做了积极的探索,从而推动了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如2.1所述,汉外语界的学者共同推动了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近些年来,外语背景的学者也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自己的母语,试图通过语料对比研究或者母语语料驱动的研究来验证、修正国外学者的理论,提

出自己的语言理论设想,或者力图寻求认知语言学研究视角与其他语言学视角结合的可能性来描述和解释汉语的语言事实。

徐盛桓将认知与语用研究结合起来,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他从认知视角出发,关注的对象是话语生成和理解的认知基础,即话语生成遵循什么认知规律?话语如何被理解?主要围绕基于心理模型的语用推理这个问题展开。徐盛桓(2008)的核心思想是,“语用推理依赖于心理模型,是创建和操作模型的认知过程,心理建模是推理的基本形式,心理模型是人们心智中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心智中的知识是人们对事物间的常规关系的认识,体现为以相邻/相似关系的抽象知识为维度组织起来的类知识。”依据“语用推理同日常话语的理解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认知连续统’”的观点,心理模型能从语用推理推及普遍的语言理解。徐盛桓建立的应用于语用推理的心理模型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对语用推理的本质、对相邻和相似等常规关系的探讨、话语生成涉及的自主—依存关系等子问题的讨论,到建立话语生成和理解的心理模型,发展为心理模型在解释成语、转喻等语言现象中的应用。

很多其他的研究者也探讨了认知语言学视角与其他视角结合的可能性,如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何奕娇,2007;张辉、蔡辉,2005),认知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的结合等。

与外语界学者不同的是,中文背景的学者具有扎实的汉语功底,了解我国汉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汉语界对国外语言学的兴趣大大提高,与外语界的交流也大大增加。在这方面陆俭明(2004,2007)对构式语法的批判性接受与应用就是一个代表。

存在句式“NP1 + V + 着 + NP2”(如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B. 墙上挂着一幅画)一直都是汉语语法解释的难点。原因有三:1. 主语和宾语的位置难以确定;2. B类句式的施事者是隐藏的;3. 按说句法成分的语义角色不同,所造成的语法意义有差异。但A类句式的宾语角色是施事,而B类句式的宾语角色是受事,但是两种句式的语法意义一致,应该怎么解释?针对这三个问题,生成语法学采用了“句式变异说”、“动词变异说”和“轻动词说”进行解释。其中以第三种理论的解释力最强,然而该理论陷入了由假设所造成的理论循环论证,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就此问题,朱德熙(1981)在论述“台上坐着主席团/主席团坐在台上”等存

在句时就提出了构式具有独立的语义的看法,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构式”的概念。在构式语法理论的启发下,陆俭明(2004)认为,采用该理论可以对存在句式进行合理的解释。首先,这样的句式可以称作“存在构式”,该构式有三个构成要素:存在物、存在处所、存在方式。这三个要素在词汇层面上投射为 NP1、NP2 和 V 着,在认知层面上则投射为一个存在的场景,按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该场景的意义并不能由词或词素的结构组合来推知,而是该构式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意义,是独立存在的。

陆俭明在应用构式语法理论解决汉语问题的同时也对理论本身进行了思考。对于 Goldberg 等学者没有解释的构式来源问题,陆俭明认为构式生成的过程为:客观存在的事件通过感官感知而形成认知图式→认知图式投射到人类语言层面形成意义框架→意义框架投射到一个具体语言→根据构式意义的需要在词库中物色具体词语来构成具体的句子。

汉语界一批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的研究也非常引人注目。他们在西方接受过语言学训练与熏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结合自己的中文背景,中西结合,为我国汉语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石毓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一方面,他扎实的汉语功底有利于他对语言学历史发展事实的把握;另一方面,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积累又帮助他在采用类型学视野的视角将汉语同其他语言进行深入对比,从而使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性和汉语的个性得到凸显。

以石毓智的概念化研究为例。石毓智(2001,2006)从历时角度出发,对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的系统差别进行了分析,说明一种语言的概念化的历史变迁是如何影响其句子结构的变化。他指出,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动作和结果的由合到分。在现代汉语中,动作与结果分别是用动词和动补结构来表示的。比如,“看”是一种动作行为,“看见”是该动作行为的结果。然而在古代汉语中,动作和动作结果通常是用两个不同的动词分别对其进行概念化的。例如:1)食:吃—饕:吃饱;2)视:看—见:看见;3)听:“听”的行为—闻:听见;4)逐:追赶—及:追赶上;5)寝:睡—寐:睡着、寤:睡醒、觉:睡醒。这种概念化的变化对语法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以前是一个单纯动词表示的概念,现在则需要一个动补结构来表示。此外,石毓智对汉英词语概念化方式的差异对句法的影响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汉英